



辽夏

关系史

杨浣 著

Liaoxia Guanxishi



人民出版社

杨浣 著

辽夏 关系史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辽夏关系史 / 杨浣著.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1-008550-0

I. 辽… II. 杨 III. ①中国-古代史-研究-辽代 ②中国-古代史-研究-西夏(1038~1227) IV. K246.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29017 号

辽夏关系史

LIAOXIA GUANXI SHI

作者: 杨浣

责任编辑: 张秀平

封面设计: 徐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www.peoplepress.net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字数: 315 千字

书号: ISBN 978-7-01-008550-0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序

杨浣博士初在宁夏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即着意于西夏与周边民族政权的关系问题,毕业留校,继续研习之。后二年,考入复旦大学,从民族史家姚大力先生读博士研究生。杨生本好学深思,又得姚师指授,乃以“辽夏关系研究”为论文选题,恣情披览古今文献,攻治不辍,苦读积年。睿思积进,学力大增。于复旦取得博士学位后,仍回母校宁夏大学。尽管宁夏的研究条件、学术氛围,远逊于上海。一时间,稻米之谋,对于他颇多困扰。然而他思虑最多的是今后的学术路子如何走?缘于旧日师生之谊,隔些日子,他就到我这里闲聊一阵,话题常是如何把自己提升到较高层次的平台上,在一定的学术领域里获得话语权。(这里只是指学者个人的学术活动可能进入的境界;话语权的真正获得,还要取决于一定时期社会的价值取向。学术潮流及政府导向性的文化政策等非个人所能决定的诸多因素。)我们海阔天空地神聊,无边际终始。我退休在家,久已脱离工作岗位,坐井观天,卑之无甚高论,无非是些当日对研究生们说过的旧话:继续加固和扩充中国通史的基础,努力培养自己的通史才能;确定方向,关注前沿和最新成果;无论做什

么项目,都要运用宏观与微观结合的方法,首先从总体上把握对象的时空环境。材料的积累和处理,须“博涉约取”。这就是古人所谓“取精用弘”。著书立说,必有宗旨,一部书的精、气、神全在这里面,无宗旨则无灵魂。用材料堆砌出来的著作,只是一具僵尸而已等等。还有读书不要心粗气浮,临文切忌率尔操觚。不竞一时之尚,勿羨骤得之名一类老生常谈。杨浣当日对我的这些不合时宜的说教并无特别的反应。他的习惯是勤学默识,偶有发问,便知其课下做的工夫并不比别人少。他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即携稿来访。我开卷便觉得其谋篇、立论、行文,气象迥异于当日旧貌。他回到宁夏大学后,于完成单位的工作任务之余,继续加工润色他的博士论文,并不时有题旨相关的新篇问世。今天,终于让我看到了一部史论兼备、胜义层出、内容扎实的书稿——《辽夏关系史》。屈指算来,杨浣入手这个课题到完成书稿,前后有十年光景。其间他所经历的生活之艰辛,困惑之状,豁然之喜,一得之乐,在周围人中,唯我知之最多。这可真是“十年磨一剑”,果然出刃如霜,寒光熠熠。杨浣求序,我义不容辞。

读其书稿,我隐然感觉到,当年在课堂、课下对杨浣和他的同窗们讲过的那些大道理,他似乎在默然信守着。这令我兴奋和鼓舞。我一向主张的学术之路,虽知之而不能行之,如今竟然有年青学人能践履躬行,是足以快慰平生,吾道不穷矣!

辽夏关系问题,在10—13世纪中国民族关系研究中是相对薄弱的部分。近代以来,学者所论,杂陈于各类著论之中,视角、题旨、立论,虽各有独见,但相互重复或偏执一隅之得者也不在少数。时至今日,如何在这个领域里推陈出新,似乎成为困扰民族史学者的一个难题。这样的学术史背景,杨浣在书稿绪论中已有详说,他

竟犯难而进,岂非勇者乎!

学术的生命在于推陈出新。然而关于宋时期民族关系史研究,今日学界颇以创新为难。欲打开这个瓶颈,首先要拓宽视野,改进方法。“胶柱鼓瑟”,势必难度新曲。《辽夏关系史》恰是一部视野和方法都有新意的力作。是书对于辽夏关系演变过程中的总体把握,不但突破传统的“天下中国观”的巢臼,而且一改以往长期以来视辽、夏、宋时期的民族关系为“三角鼎立”格局的视角。“天下中国观”的主体内容是“王朝大一统”和“夷夏之辨”。秦汉以降,“正统论”亦渐行融入。这些思想观念一直牢笼着古代学人理解政权、民族间的关系,其影响至今未能消除。无怪乎近代以来学者们在讨论分裂时期各政权之间的关系时,总是要把它转换为“实现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的关系”。(见本书《绪论》)笼统而粗疏的“三角关系说”,往往把宋、辽、夏看作是“三分秋色”的均衡鼎立关系。而且多是分别治辽、宋、夏史者兼治此“三角关系”。各以所治政权为本位,辽自辽,宋自宋,夏自夏。说关系,只说“两造”,不谈三角,与三角以外的其他部族政治势力,略无关涉。如此研究,纵有一隅之得,也不免扞牾揣龠之讥。杨浣的研究,打破了宋辽夏三足鼎立的“后三国模式”的成说,明确提出:“在宋、辽、夏的三角关系中,西夏始终都是辽宋的共同属国。唐朝的大一统政治格局在澶渊之盟后嬗变为以辽宋为中心的两极化格局。西夏的称帝建国,成为打破这种二元格局的一大威胁。为此,联合起来,反对来自西夏的挑战是宋辽共同的持续性方针。宋辽的联合,有效地遏止了西夏成为第三极的企图。”(见《绪论》)此段文字,相当明晰而确实地揭示着全书论旨,给以后各章的叙事和议论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它是这部专著的宏纲,也是作者所发明的胜义之

一。

这个宏纲的提出,又是以全面系统地考察和把握该历史时期中国各族政权之间的政治关系史为基础的。这个基础的获得,观察高度的提升及其新视角的所下识断的坚决与明快,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以杨浣之好学深思,默默耕耘多年,才有今日的收获。他的艰苦研究所得,除了表现于书稿正文外,还凝结在一系列表格中。全书有12种表格分布于相关各章节,其中有少部分所从史册或近人论著中摘取或析出的,大部分是依据文献资料设计制作的。篇幅最大为全书殿最的一幅是《辽夏通使年表》,表中辽宋夏三方交聘史实并列,全部征引辽、宋及清人文献,资料出处详明。还澄清了《西夏书事》卷4—卷33所载相关史事的史料来源,纠正了部分史实错误,补充了未载之事近20条;考出《辽史》未载之事近20余则;发现辽、宋及清人文献所这证有明显歧异的10余处,存疑若干。此表实即辽宋夏政治关系史大事纪年。是非通览全部相关文献,加以整理、纂辑、排比不能制成,在爬梳史料的同时,还要做大量的考订,勘误、补缺的史科学工作,才能有如上的创获。

史表的制作最能检验史家的史科学功夫和史料解读的能力。每表必有一题,按照题目的要求,入表材料须纵横排列,或左右相联,或前后相顾,具内在的逻辑关系自然显现出来,从而表达了制表者对史事的识断。即使是仅仅为了节省篇幅,在主要事件冗长的叙述之外,副之以归纳统计性质的简表之类,仍然不能没有制表者对历史的理解力。所以史表的制作,虽然琐碎繁难,它却是史家才、学、识“三长”的综合表现。阅读《辽夏关系史》各类表格,自然会体察到作者的勤勉与匠心。

读书心细眼明是杨浣学业上的一个优点,也可以说是优势。

试看本书中数例：他可以从辽圣宗、辽道宗《哀册文》中读出夏对辽的属国地位和辽夏关系发展初期，辽经略河西和西域的成效；他从《辽史》、《长编》等大宗史料的细微之处，读出辽圣宗对和亲西夏的兴平公主之死的心理感受和行为反应；他从《西夏书事》的一则附记中，以注文的形式专门考察了辽圣宗时期皇太妃西征事。考出这次西征的对象是阻卜，不是党项，并引《武经总要》等宋人的著述证之。他又多方钩稽史料，论述了学界鲜有讨论的西辽和西夏的关系；考论了《辽史》中“唐古”与“党项”两种称谓的缘由和二称的微细区别；设专章（第七章）考述了辽朝对西夏的边防机构，考出《辽史·百官志二》所载“西南面详稳司”这一机构实际并不存在，“详稳”一词是对将领的一种称呼。又详细地讨论了辽代特有的一个职官称谓“五押”，驳正了前人的误读误解等等。不胜枚举。

《辽夏关系史》也大量吸纳了近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凡所称述，皆原原本本，绝布断章取义，更无掠人之美之嫌。对于和自己有异而十分重要的观点，他则两项对照，便于读者自行判断。如关于宋辽夏三角关系的分期有一种说法与自己不同，他就制表并列两种分期法，说明二者相异之处，并说明出现差异的原因。读者观表，可以互见二者长短。这样既表明了自己的客观态度，又借以彰显了自己的独见，实是比较方法的一种妙用。

本书是宏观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成功尝试。全书各章，皆有提纲挈领的宏观概述，又各有深入细致的考证和论析。立说宏阔而不空泛；考论精微而不细碎。作者对于辽夏关系演变的历史作了长时段（上溯下延），大空间的观察。凡对辽夏关系产生影响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被纳入讨论。涉及各族各政权的社会组

织、政治机构、军事外交、多边贸易、国内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作者都给予程度不同的关注,阐幽发微,几无余蕴。所以,从研究方法的创新来说,我很推重杨浣这部《辽夏关系史》。

是为序。

王天顺

2009年11月26日

目 录

序	王天顺(1)
绪 论	(1)
第一节 题旨与意义	(1)
第二节 基本史料与研究概况	(5)
一 基本史料	(5)
二 研究概况	(8)
第一章 辽夏关系的时代背景	(18)
第一节 民族分布状况	(18)
第二节 政治权力格局	(25)
第三节 北族王朝性质	(28)
第二章 辽朝对境内党项的经营	(34)
第一节 辽朝对境内党项的征服过程	(35)
一 述鲁时期	(35)
二 太祖时代	(37)
三 太宗以后	(42)
第二节 辽朝对境内党项的统治体制	(45)

一 部族制度下的唐古	(46)
二 属国制度下的党项	(56)
第三章 辽朝与定难军的关系	(69)
第一节 “开运元年”的冲突	(70)
第二节 “夏州事件”中的辽朝因素	(71)
第四章 辽朝对外战略与对夏政策	(78)
第一节 扶夏制宋时期(986—1005)	(79)
第二节 束夏善宋时期(1005—1067)	(90)
一 河西之争(1006—1032)	(92)
二 部族之争(1033—1068)	(99)
第三节 助夏和宋时期(1068—1120)	(106)
第四节 联夏抗金时期(1120—1125)	(115)
第五章 西辽与西夏的关系	(128)
第一节 政治关系	(128)
第二节 经济关系	(131)
第六章 宗藩关系与东西贸易	(136)
第一节 辽夏关系与东西交通	(137)
第二节 辽夏贸易中的外来商品	(151)
第三节 辽宋时期中国陆上丝路贸易的特点	(155)
第七章 辽朝对西夏的边防机构	(160)
第一节 西京诸司	(161)
第二节 西北路诸司	(194)

第三节 辽朝对西夏的边防体系	(196)
第八章 辽朝对西夏的通使制度	(205)
第一节 辽夏通使制度的确立	(205)
第二节 辽朝对夏通使的规定	(207)
第三节 西夏在辽朝对外关系中的地位	(227)
第九章 宋人的辽夏观及其北疆方略的变迁	(240)
第一节 宋人对辽夏政治地位的看法	(241)
第二节 宋人对辽夏军事威胁的评估	(246)
第三节 宋人北疆方略的变迁	(248)
一 “北平幽朔,西取继迁”	(249)
二 “屈己修好,弭兵息民”	(251)
三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	(254)
四 “经略银夏,复取燕云”	(266)
结 论	(275)
第一节 辽夏关系的性质	(275)
第二节 辽夏关系的分期	(278)
附 辽夏通使年表	(285)
参考文献	(373)
后 记	(382)

绪 论

第一节 题旨与意义

“10至13世纪的中国是多个民族政权并存及从分裂走向统一的时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¹许倬云先生认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各民族、各政权关系,应该超越汉族本位的意识。他说:“近古从安史之乱以后,中原本部以外,各种民族力量崛起,纷纷在西边、北边建立政权。不仅中国不能忽视这些力量,中国的文化也躲不开他们引进来的一些影响。宋代的中国,与辽、金、西夏、蒙古、大理、高丽,甚至日本,都曾前后同时并存,这是一个多方体制的格局。中国与这些单位之间的关系,既有和战,也有交流。可是至今,我们看见的宋人历史,好像多从宋人角度看和战问题,很少注意到这些单位之间纵横捭阖,对于中国造成的影响。也有专家注意到辽、金、蒙古在进入中原以后的改变,但其前其后的演变,通常不在我们注意之列。”因此,只有“从多国体制的角度来讨论这些同时并存单位的恩恩怨怨,分分合合,

也许对东亚这个地区的整个历史,(才能)有更清楚的理解,也对中国(此处指宋朝)在这个棋盘上的角色,(才能)有更清楚的了解”。²

诚如许氏所论,这一时期中国也就是古代中国人狭义的“天下”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多政权、多民族并存的“国际体系”³或政治权力格局。在这一体系内部,最为重要的关系固然是宋辽、宋金等强大政权之间的博弈,然而一旦它们形成势均力敌的制衡状况,并且以盟约的形式长期地固定下来的时候,反而是处在它们的中间地带或利益关联地区的某些弱小势力(帝国或城邦或部族)突然会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斗争的热点与焦点。本书讨论的对象之一西夏王朝恰好就是这样一个因为宋辽政权长期南北对峙而充分地享受两面性的实用主义外交成果的典型。当然,在发展友好的对外关系方面,西夏仍然有着一定的倾向性的,那就是自始至终力求维持与辽朝的战略同盟关系。

与宋朝的华夏的、农耕的社会性质不同,辽朝和西夏都是崛起于汉地社会边缘的以游牧起家的北方民族王朝(北族王朝⁴)。它们“通常是受到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的消极对待,(它们)都被视为中国历史大转弯处的阻碍”。然而,这“每一个政权都由非汉人的统治集团所建立。在保持自身文化特性的同时,它们都统治过一个包括众多汉族人在内的多民族的政权,并且控制了曾由汉族人长期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每一个政权,都向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至上观及其国际秩序观提出了挑战”。⁵

从公元986年辽朝正式扶夏制宋开始,到公元1125年西夏被迫弃辽附金为止,辽夏双方以同盟友好为主的关系持续了140年之久。正是以辽夏同盟关系为基础,北族王朝才实现了对汉族王

朝主导“天下中国”⁶ 秩序的这一传统模式的有效制衡。应该说辽夏关系是 10 到 12 世纪中国“天下”体系中最为核心的轴心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了区别于传统的以文化冲突为核心的华夷之争的另外一类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即北方非华夏民族之间的关系。虽然看起来这种关系似乎并不是缔造多民族、统一的现代中国的核心民族关系,然而,它对中国政治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在某些时期甚至是决定性的、方向性的。有时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关系看作是不同地域集团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长城以北的和黄河以西的军政集团之间联手对付南方农业帝国的“西、北相结”现象。如汉代匈奴与西域诸国,两晋“五胡乱华”,隋唐突厥与土蕃等。

近代以前,囿于民族偏见和正统史观的束缚,人们甚至于对辽、夏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也难以准确把握,自然对处于复杂政治格局下的辽夏关系史更鲜有问津。1950 年代以来,在民族平等史观的指导下,中国学术界对辽夏关系史的研究获得了快速的发展。但是,由于现存文献资料有限,加上研究时间不长等方面原因,辽夏关系史的研究与宋辽、宋夏关系史研究相比,无论研究成果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处于滞后状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一些研究者依据的史料不够准确,运用史料缺乏进一步的考证。关于研究辽夏关系的史料,相当一部分来自清代学者整理的文献,尤其是吴广成的《西夏书事》,“这位晚清学者喜欢抒发己见,喜欢据微不足道的材料来修润干涩的史实,也喜欢评论星象和以典型的儒家道义规范来解释人们的言行。细心的读者很快就能发现,他的文章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修润笔法。我个人认为他有些解释纯属雄断,并没有什么现存文献的证据”。⁷ 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些史料或者由于出处未明,或者由于内容改窜,极易造成对历史真相的误

读。其次,研究者无法摆脱旧有的解释框架,难以推陈出新,而使研究成果成为旧观点的注脚。从辽夏政治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当传统的以西夏诸帝对辽关系的变化为标准的分期模式一直为研究者所袭用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在新史料出现之前,关于这个问题的阐释空间已经相当有限,能否转换视角就成为研究深入的关键。第三,辽夏关系的研究视野大多集中在政治史领域,缺乏对军事国防制度和经济史的关注,诸如辽夏关系中具有开拓东西方贸易的意义的经济层面,以及辽夏关系起举足轻重作用的边防制度、通使制度的具体情形。第四,外围世界对辽夏关系的反应也是研究缺失的一个重要层面。因为主体史料来源宋人的关系,因此研究宋人对辽夏关系演变的看法与对策恰恰是我们研究的最大优势所在。第五,由于许多研究成果分散于其他主题的论著中,因而造成了部分研究者在学术史回顾和一些具体问题的论证上常常不大注意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本书立足的研究基点是根据辽朝政权利益和对外战略的转移来重新评估辽朝对夏政策的演变及其意义。就辽夏关系的实际情形而言,宋、金两政权是影响其走向的主要外部力量。最初辽宋武力对抗,辽朝扶植西夏以牵制宋朝;接着宋辽缔结和平协议,宋辽联手遏制西夏图霸;之后西夏在宋朝的强硬政策下日渐衰微,辽朝为确保南北均势不被破坏,便积极支持西夏与宋朝议和;到了辽朝末期,金朝崛起并在金辽战争中势如破竹,辽朝被迫给予西夏对等政治地位以求联合抗金。

第二节 基本史料与研究概况

一 基本史料

作为辽史、西夏史、宋史等多个政权史研究的一个交叉性子课题,辽夏关系史的基本史料主要来自于记录和描述这些王朝历史的文献中。

在以辽朝为主体的文献中,涉及到辽夏关系内容的文献主要有《辽史》、《契丹国志》、《辽史纪事本末》、《辽史拾遗》、《全辽文》⁸、《全辽金文》、《辽代石刻文编》、《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⁹等。其中以《辽史》和《辽代石刻文编》的史料价值较高。

《辽史》,元脱脱等撰。其卷115《西夏外纪》,“起自李继迁至辽亡之时夏崇宗乾顺之世,按年系月举其大要,内容颇为简略,基本是将《辽史》本纪中历朝皇帝与夏政权通使朝聘等记载汇编而成。其中记载西夏风俗物产的史料为其他宋代史料所罕见,颇为珍贵。《辽史》兵卫志、地理志、百官志、礼志、食货志、部族表、属国表及近40个人物传中,都包含有西夏史料,比较重要的有萧惠、萧迭里得等传”。¹⁰

《辽代石刻文编》,向南辑录。全书收集辽代庙碑、塔铭、幢记、哀册、墓志、题记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石刻文三百余篇,堪称20世纪末以前发现的辽代石刻文献总集。《文编》中关于辽夏关系的主要有《圣宗皇帝哀册》、《耿延毅妻耶律氏墓志》、《韩椅墓志》、《赵匡禹墓志》、《耶律仁先墓志铭》、《耶律庆嗣墓志》、《韩瑞墓志》、《道宗皇帝哀册》、《北大王耶律万乙墓志》等文献。这些石刻文之前皆有简要说明,记述其出土时间、地点、形制;文末则附有